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LIMITED

TD/L.353
1 May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九届会议

1996年4月27日，米德兰特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先生1996年4月30日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大会发表的讲话

有时，一个人必须获得再生才能希望得到拯救。机构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在复兴贸发会议之时，为其选择南非作为会址是再好不过了。

随着这一最为残忍的世纪即将痛苦地结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恢复了我们对人类兄弟之情以及人类治愈创伤和宽容谅解精神的信任。

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屠杀事件后，南非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南非活生生地证明，当今世界仍能出现和平与和解的奇迹。

我们与希特勒和艾希曼以及斯大林和贝利亚同处一个时代。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与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同处一个时代，他的慷慨大度和智慧使得这一奇迹成为可能。

为了能同你们一道分享贵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独特和宝贵的时刻，我们向南非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南非人民的榜样将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同样大胆地争取建立我们新的伙伴关系，并且同样成功地建立一个新机构。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在干练地总结星期六的两个高级圆桌会议时指出的，全球化和市场的统一既是“一个新现实，也是一个无法扭转的现实。”在我看来，这是各种文化和文明接触和统一的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顶点，这一进程始于十六世纪，即后来所称的“发现的时代”。

如何在面临这两个被普遍接受的现实的情况下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设法利用出现的机会，并且共同努力，尽可能减少这些现象引起的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对最易受打击者的风险，是我们在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大会之际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项重大挑战，那就是要确定贸发会议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机构的今后的作用。贸发会议3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公平经济发展这一事业，并且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贸发会议今后存在的唯一根据必须是它仍很重要，并且对成员国作出切实贡献。所以，为使大会取得成功，各位作为我的股东（这里借用了一个比喻），应使贸发会议得到革新和振兴，使其能够在今后更好地为各位服务。

各位知道，铭记着这一目标，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对秘书处进行全面改组：9个司减至4个司，开展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各活动领域的协同性的工作，并在同时大为减少官僚辅助机构。我要强调的是，这次改组不是由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所触发的，改组的目的是使贸发会议跟上时代步伐，并反映近年来世界发生的许多变化。

因此，各位的任务是：确定贸发会议的优先事项和今后工作方案，设法为发展方面充满活力的“新的行为者”——私营公司和文明社会的成员——提供便利，以便给正在成形的新机构注入活力。与调整有关的许多重要细节必然要依本届大会的结果而定。但在此之后，应当尽快使新结构开始运转，为此，需要体现出必要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我们自然欢迎人们就如何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改进贸发会议并大为提高其有效性——提出各种建议和主张。

本届大会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全面改革政府间机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1995年12月的第十八届特别会议上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认为，成员国已就这方面的方向形成许多共识。现在，成员国必须完成工作，以确保贸发会议的所有机构均能在大会于5月11日闭幕之后即开始充分运转。为此，大会必须处理诸如政府间机构的职权范围等事项的细节。

最后，就准备工作而言，大会应为今后几年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在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毫无疑问，优先事项的确定不应妨害贸发会议在贸易和发展领域的总任务。如果不具备关注全球的能力，不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对成功的发展经验作经验研究，贸发会议就无法向最需要得到技术援助和政策咨询的国家提供此种援助和咨询。

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最近的新作“*The Age of Extremes*”中，这位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现已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操作单位，老的单位，如国家经济，正在成为他所称的“跨国活动的并发症”。他还写道：

也许二十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公共机构和人类的共同行为却又无法认可这一点，因此这两者难以调和。

现在，人们被从世界各地召集到南非，共同决定其中一个公共机构的命运，我们也许同意Hobsbawm的判断，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证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鉴于成员国在日内瓦进行会前谈判过程中所作的共同努力，并鉴于星期六开幕那天的活动取得的极大成功，我确信前景看好。

一个令人担心的时代

然而，此种共同努力的背后却是普遍存在的担忧和惧怕，一种无名的惧怕，这种惧怕也许是自早期的航海家为前往陌生的地方寻找珍宝而在未标明航线的大海上航行以来最为强烈的，这些珍宝结果往往是一些神话。恐惧是会传染的，也会使不知所措。在这一点上，表面上强大的政府和微不足道的个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有两个基本原因导致因恐惧而引起的普遍不适状况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一是担心未来，担心失业、工资减少以及国家日益贫困。二是觉得不公平，认为全球化的代价将再次由贫困者和弱者支付。

对于恐惧，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我们必须以实际方式证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人们应更多地指望未来而不是现在。但相信未来就等于抱有希望。而希望是不能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随着国家壁垒的消失和一个单一的统一市场开始形成，竞争有了加剧。竞争如同每一种游戏一样，需要有公平的规则和得力的仲裁者，需要有能使国家和人们在平等基础上竞争的规则，还需要有执行这些规则的高效率的政府和国际组织。

正是在这一方面，贸发会议1992年在卡塔赫纳通过的“为发展结成伙伴关系”这一口号才应在今后被赋予真实意义。伙伴关系意味着团结，意味着肩并肩共同努力，并向在应付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全球经济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提供帮助。我们既要讲竞争，也要讲团结互助。

这就涉及贸发会议的使命。贸发会议必须而且将仍作为世界发展良知的卫士，争取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并缩小国家间的差距。这些差距正在扩大。而且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力量会使此种差距拉得更大，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变得软弱或不敢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因此而找到新途径，如信息技术途径等；并制订发展战略，尤其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国以及依赖一两项商品创造的出口收入的国家制订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摸索出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调动

私人资本和专门技术的途径，从而为各国的贫困者乃至世界上的穷国创造经济机会。

许多穷国都在我们这里即非洲，这就使本届大会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些国家越来越容易受变化莫测的全球经济力量的影响，多国机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找到恰当、充分和及时的解决办法。

贸发会议必须日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意见和实际支持，这些意见和支持应与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纳入世界经济方所处的不同阶段相称。与此同时，贸发会议必须仍发挥作为开展讨论并就发展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世界论坛的作用，并在同时提供高质量、面向发展的宏观经济研究，以便向成员国提供其所需的智力手段。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今后的任务

关于贸发会议在今后时期内具体而言应做些什么，首先有必要区分在完善供应能力方面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市场准入、或者对资本或技术的获取方面有困难的发展中国家。贸发会议有着在这两方面开展活动的内在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更好和更充分地纳入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显然至关重要。

随着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贸发会议在承担一些相互有联系的工作方面具备了独特条件。首先，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正设法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现有29个国家准备加入——作好准备，应付将对其提出的新要求；可以向其解释这一更可预测的管理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还可以就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影响向其提出咨询意见。

其次，应授权贸发会议从宏观和微观经济这两个角度来处理边缘化和遭到排斥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新问题。但就此采取切实行动的政治意愿到现在为止总的来说缺乏。如果一种旨在统一世界并使其一体化的力量最终却将一些人民、国家和大陆排除在外，这将是一种历史的异常现象。被排除在外的20亿人尚未得益于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遍成功。但是，市场以及使市场运转的私营部门的力量能够而且应当用来将贫困者纳入发展进程。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迄今为止的工作的一个特点，应受到鼓励和进一步推动。我们在贸易和环境方面的工作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这方面，我深信，环境经济学不久将日益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贸发会议将能对有必要开展的研究工作作出有益贡献。

我还认为，贸发会议必须更加重视投资和企业发展。投资和企业发展是增长的动力，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唯一途径。贸发会议同其他机构一样，也认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至关重要。同时，跨国公司有能力向各国提供增长和发展所需的难以与之匹敌的一揽子投入。正如贸发会议指出的，世界上正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

近来有些人对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的关系提出疑问。任何关于能否容得下两个组织的疑虑现在都是多余的了。两个组织现正逐步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关系。Ruggiero 先生和我于星期五宣布的为非洲执行的联合技术援助方案便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非政府组织、发展协会以及文明社会其他部分的确正在发展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那么，我们都有义务找到更好的途径，将这三者纳入贸发会议的工作。我非常希望本届大会能抓住这一时机，给予这三者在我们处理发展问题的日常工作中应得的地位。

结 论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在一项均衡的增长和发展战略基础上达成共识。我们必须使竞争辅以团结互助，在注重市场创造财富和革新的效率的同时，争取使国家能够有效地为增长、收入分配和人的发展提供法律和体制框架。我们必须确认，各国应在采取其发展所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负起主要责任，还确认，正如哥斯达黎加总统指出的，我们自己不想承担的事情是没有人替我们做的。但是，如果说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主要责任是一项必要条件，仅仅具备这项条件是绝对不够的。我们绝对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起扶持作用的外部经济增长环境，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合作精神，提供官方援助和债务减免，这对如果仅靠自身有限的资源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简言之，我们今天同32年前一样，需要有同样的决心来应付不平等现象普遍、绝对贫困以及人类失望等项挑战。首先，我们最为重要的义务是帮助贫困者中的最贫困者、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弱小国家。就贸发会议而言，以及就我个人而言，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真正为消除绝对贫困、使这一类国家脱贫这项事业作贡献，是一项重大的道义上的承诺，也是一个荣誉问题，这一类国家的存在等于是在控告我们没能成功地对付最为极端的贫困。正如人们常说的，对人们作出评价，要以人们如何对待国际社会最弱和最易受打击的成员为依据，就我们而言，要以我们如何对

待贸发会议最弱和最易受打击的成员为依据。

这就使我又回到公正这一主题上，而且首先是对作为我们今天会议所在地的这个最为贫困、作出最大牺牲的大陆即非洲的公正问题。非洲发生的暴力、人民的痛苦和贫困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大和最严重的失误。我们都应当感激非洲，因为我们几百年来从非洲夺走的东西太多了。我来自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靠非洲的被强迫劳动者建设起来的国家。我国的一位保守派政治家150年前在议会发言说：“非洲创造了美洲的文明”。他说这话是为奴隶制辩护，但他说的却是实话，因为没有数百万非洲人的勤劳智慧和艰苦创业，文明就不会在我国和许多国家产生。我们从来没有归还给非洲任何东西，哪怕只占我们从它那里夺走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诗人 T.S. 艾略特的诗句完全适用于我们：

“我们从幸运者那里继承的一切
都是我们从被击败者那里夺走的”

现在是开始偿还这笔巨大的人类和社会债务的时候了，这项债务要比另一项债务即欠银行和政府的金融债务大得多。我们必须用明智和切实的办法满足非洲的需求，这是受另一位伟人即 A. 施韦策的启发，他致力于照料非洲人，将自己称为“认识方面的悲观主义者，希望和行动方面的乐观主义者”。我想再次引用艾略特的诗句：

“历史可以是奴役
历史可以是自由”。

这次历史能否摆脱饥饿、贫困和疾病，就看我们自己了。为此，我们无需抛弃过去。相反，我们必须重新点燃我们原先的激情、重新激发我们对公正和进步的原先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在同时彻底改革贸发会议，并恢复以往正确而且现在仍正确的东西。将来，当人们记起贸发会议的这届复兴大会的时候，我希望人们能用 T.S. 艾略特的诗句来形容我们：

“我们的终点寓于我们的开端，我们的开端寓于我们的终点”。

XX XX XX XX XX